

海外办学,做好“吃苦”准备好了吗

■本报实习生 赵鹏飞 记者 陈彬



图片来源:全景网

日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英国开放大学签约,正式决定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天津校区以及北大天津中心。这一消息引发了各界对高校海外办学的又一次关注。

应该说,在海外办学的道路上,北京大学远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学校。目前,在国内高校中,有苏州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5所以上的大学在海外建立了分校、校区或联合创办大学。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是否一帆风顺?当下又是否已经到了大部分国内高校可以海外办学的阶段了呢?

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内高校在与国际高等教育“接轨”的进程中,最早“走出去”的是师资,即国内高校教师到国外任教,这算不上是“走出去”办学,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师资向海外的流动为“走出去”办学做了一定的铺垫。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孔子学院”的设立。

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6年末,全球已经有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

作为国家层面的行为,通常孔子学院都会跟国内的某个高校有合作关系,师资由国内高校外派的教师和志愿者组成。因此,孔子学院可以说是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的一种尝试。

2008年开始,从通过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批准,到海外注册、成立学校,苏州大学创办的老挝苏州大学开创了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的先河。此后,其他高校也逐渐迈开了海外办学的步伐。

汪解先的老挝苏州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作为亲历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觉得高校海外办学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流动。

“教育资源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由教育水准较高的地方向较低的地方流动,这是必然趋势。”汪解先说。

在他看来,从国际上看,教育的合作交流是一种服务贸易,也可理解为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这和国家层面的战略有很大关系。

“国家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了教育的主动走出去,随着中国教育水准的提高,我感觉高校海外办学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他说,“我的基本理解是,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形成的一种现象,不是某个学校异想天开的事情。”

对此,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也表示:“海外办学说明中国高校正在谋求在国外发展,这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和实力,说明中国高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所承认。”

除了自身教育水平的发展之外,高校的海外办学还承担着文化传播的作用,中国高校也不例外,甚至这种作用要更加明显一些。

比如,对苏州大学来说,海外办学就有推进学校教育国际化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两个目的。事实也证明,老挝苏州大学的创办提升了学校在老挝的知名度,推广了中国文化。

“第一,学校搞合作办学来引进国外优秀教育资源,但只引进搞不成国际化,我们也开始走出去办学;第二,在老挝的中资企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懂中文和中国文化、又具备一定专业技术的本地人才,老挝苏州大学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困境。”汪解先说道。

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谓“万事开头难”,在我国高校海外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当下,这些“先行军”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资金是我们办学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回忆起到老挝办学遇到的现实困难,汪解先说。

据他回忆,最开始的时候,苏州工业园区在位于老挝万象的新城开发区规划了大学,并邀请苏州大学参与建设。然而此后,工业园区的撤回让老挝苏州大学失去了经济依托,一路筹集资金非常辛苦。

“资金的欠缺导致了学校在发展上的缓慢。”汪解先说,自2012年首次招生以来,老挝苏州大学一直在租来的三层教学楼上课、办公和生活。计划中的新教学楼虽然已经开始修建,但由于资金问题尚未完工。目前,规划的350亩土地仅建造了6000平方米。

资金的问题还不是老挝苏州大学一家所独有。比如在一篇文章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熊建辉就曾表示,在海外办学的过程中,高校其实是承担着高财务风险的。

“我国现行财政政策法规明文规定不允许公办高校对境外办学进行投资。因此,要保障境外办学的经费,高校所面临的压力不小。”在文章中他表示,目前高校海外办学经费均需依靠募集社会资金来提供,如果无法在办学经费上得到保障,那么就很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甚至是被迫终止境外办学项目。

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高校是存在类似教训的。例如新南威尔士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仅仅维

持了两个月,就造成了3800万美元的损失;密歇根州立大学迪拜分校已经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对此,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希望高校行动前一定要进行充分论证和准备,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出去办机构不是件容易事,跨出去了,再收回去就更难了。因此,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他说。

一道难迈的门槛

林金辉所在的厦门大学也是海外办学的“先行军”之一,2016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宣告成立。而作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最初的论证和考察者之一,别敦荣对高校外办学面临的现实困难也有着深刻的思考。

在他看来,除资金问题外,与合作方的关系、对外国法律和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国外教育市场的把控能力等都是问题,同时也都涉及到中国的相关政策、法律问题。

“学校出国办学由谁批准?批准后出现问题的责任由谁承担?”别敦荣说,以厦门大学为例,该校在国外办学需要颁发厦大文凭,而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这些外国学生没有来中国上学,也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考试,政府会承认他的学历、学籍吗?”他问道。

此外,课程设置和国外校区的的管理问题是绕不过的“坎”。在别敦荣看来,高校要做好准备和研究,做好资源和人才储备,要研究国际化办学、国际规范,采用国际共通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要有国际化人才去经营。

“比如,英国的大学、澳大利亚的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学,学生学习的专业、课程,要求与在英国、澳大利亚完全一样,它们甚至宣称分校办学与本部办学是等值的。中国大学海外办学就做不到这一点。”他说,这是因为中国许多课程首先并不具有国际共通性。比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国外就无法开设。其次,海外校区的管理需要熟悉国际关系、法律、语言的国际化人才和教师,但这些人才在我国大学是紧缺的。

在采访中,熊建辉也表示,从老挝苏大和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的办学定位来看,传播中华文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开设的中医、中文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专业似乎与孔子学院的定位出现了“重合”。

对此,熊建辉建议,境外办学的高校需要在“汉语教学”比重上下功夫,将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习的基本课程,而不是一门专业来设置。“或者直接将汉语教学任务交由孔子学院完成,在具备基本的汉语能力后再衔接到校的学习中来”。

一份必要的扶植

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该文件称,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起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并明确表示,支持高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

那么,这是否代表我国已经进入高校可以大规模开展海外办学的阶段呢?在采访中,别敦荣和汪解先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现在只有少部分高校有能力尝试去做这件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具备大规模向国外开拓的实力,有些高校的海外办学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别敦荣说道。

事实上,也的确有部分高校在海外办学的过程中遭遇了产权纠纷、办学质量不被看好、合作关系不稳固、对国外相关法律不熟悉等一系列问题。

“高校海外办学要有条件、办学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做基础。”别敦荣说,“要注意的是,海外办学应量力而行,由小到大。万一出现问题,可能使国内办学陷入不利。若出现舆情、法律等问题,就会影响大学的声誉和财政。”

除此之外,现阶段高校海外办学还需要政府大力支持。

“‘走出去’办学是高校的事,也是国家的事。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这项工作要有开放支持的态度,还要有实际的支持措施。‘一带一路’若无高等教育的参与,其持久难以保证。所以,‘一带一路’延伸到哪里,大学就应该办到哪里,这样才能形成和开拓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人才条件。”别敦荣说道。

在对政府支持的需要上,汪解先和别敦荣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表示,政府应根据“一带一路”战略来布点。在合适的地方,要国家布点,投资,学校办学,避免高校“负重前行”。政府“搭把手”,才能让高校在海外办学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对此,熊建辉也认为,我国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时间短、经验少,急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一规划。首先,要统一协调外交、商务、文化、教育等部门力量,形成支持和推动境外办学的合力。其次,要统筹考虑市场服务和对外援助不同发展路径,调动社会积极性,鼓励多渠道开展境外办学。然后,要通盘考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境外办学,考量服务外国学生和境外华人华侨子女的受教育需求,加强对人才培养和目标市场的深度研究。

中国大学评论

近日,清华大学宣布将于今年开始推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将本科专业归并为16个大类招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改革。为此,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校长邱勇担任组长的“大类培养领导小组”,同时聘请16位学术“大咖”担任首席教授。

大类招生与培养本质何在?这一制度与“按专业招生和培养”有何不同?

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将“专业”当成了人才培养的实体,“按专业招生和培养”基本意味着学生属于一个固定的“专业”实体,大学也往往有一个与专业同名的教研室或者院系的教师组织。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学者对“专业”概念的不断追问,高等教育界逐渐认识到,专业本质上就是一组柔性课程,学生学完这组课程就会形成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获得专业的毕业证书。因此,大学可以没有与专业同名的学生班集体,也不一定与专业同名的教师组织。专业作为柔性课程组织,使得跨学科专业设置和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成为可能。

教育实践中,北京大学以元培学院(住宿学院)为平台、多院系协作建成“政经哲”等三个跨学科专业。实践证明,新的专业概念在理论上可能,在实践中也可行。在北京大学“政经哲”以及其他跨学科专业背后,确实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实体的“政经哲”学院或者系、教研室,这表明新的专业概念已经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从理论走向了现实,开启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更多可能,特别是为“新工科”专业建设提前积累了经验。

专业是一组课程,那么一组专业如果有一半左右课程较为相似,就可以对这些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使学生在前两年学习共同课程,这组专业因此就形成了“专业大类”。由于学生在学习共同课程的第一、第二学年,其所学课程高没有特别区别,因此,这期间学生在本质上不具备专业身份特征,只能属于一个专业大类。按大类招生与培养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教学计划调整。例如,北京大学经济学类之下,包含六个本科专业: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和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浙江大学在对课程进行更大范围调整之后,大类所包含的专业更多,学生可选择的专业范围也更广。例如,该校“理科实验班”大类下包含7个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含运筹学方向)、信息与计算科学(含信息处理与信息安全方向)、计算机图形学方向)、统计学(含金融数学、保险精算、生物统计方向)、物理学、化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含心理咨询方向)。

大学如果将通识课程集中在第一年,那么招生大类可以更加简约、集中。上海大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最前面,该校2016年将58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工学工学类三大类。

大类招生与培养改革始于2002年。那一年,山东理工大学也提出了与上海大学类似的大胆改革方案,将全部专业划分为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与培养。为与当时高考录取政策相协调,该校以“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作为大理工科的虚拟招生专业,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大文科的虚拟招生专业。这项改革曾经获得国家教学改革成果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校此后退回按专业招生和培养的老模式。“2015年山东理工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第十六条为:该校2015年实行按专业招生,分类培养。这种倒退虽可能是从实际出发,但仍然凸显出“按大类招生和培养”的不易。

按大类招生和培养的第二个难点就在于之后的专业选择和分流。如果高校在这个过程中更加以学生为中心,那么一定会有一些专业选择人数太少,或者是选择该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并不优秀。这一点与传统根据教师数量安排招生计划、不允许转专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冲突,高校需要根据学生选择对教师编制、教师授课任务予以调整,一些专业可能面临撤销的可能。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大阻力所在。

邓溪瑶等研究者基于一所顶尖大学2004—2009年毕业的16320名本科生的四年GPA大数据,对分省生源在大学的学习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生源表现最为优秀。根据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该省今年“实行专业平行志愿,一所高校的一个专业(类)作为一个志愿单位”。上海大学按照三个大类在浙江招生,假设另外一所大学继续按照单一专业在浙江招生,那么考生报考上海大学的一个大类将有更多专业选择机会,这意味着上海大学会有更强招生竞争力;北京大学如果将可以选择全校130个专业的元培学院大类200人投放浙江,将在“985工程”高校中获得最强生源竞争力。这表明,按照大类招生与培养的教学改革和知识传承组织模式调整其实有着现实的迫切性,这比招生人跑断腿、磨破嘴要多得多。如果一所高校尚未有进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变革,那么这所高校在生源竞争中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大类招生培养为何如此重要

卢晓东

让理论学习成为习惯

——北京科技大学教职工理论学习工作纪实

■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4月13日下午,北京科技大学化生楼里那间面积不大的报告厅再一次被挤得满满当当,除了出差和临时有实验任务的教师外,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60多位教师都来参加了理论学习。

不仅是这一个学院,从2015年11月学校发布《北京科技大学关于加强教师理论学习的通知》开始,每周四下午都是全校教职工固定的理论学习时间。每个月,除了一次集中理论学习外,还至少有一次党支部生活和两次自选内容。

如今,理论学习开创了北京科技大学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真正让教职工主动学、乐于学,并将理论学习当成了一种习惯。

从担心到认同

其实,对于教职工理论学习,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教师李新学最初是有些担心的,他怕内容空洞,“结果一学,发现收获很大”。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对于党员的高标准和底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李新学说,“党员意识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增强,比如今年春节前夕交党费,以前可能会觉得‘已经交过党费了,怎么还要补交’,但现在知道这是党员义务,也就顺利补交了。”

李新学觉得,我国的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发展性,不学习就会不了解。“比如说对于高校发展,国家现在要推行‘双一流’建设,我们学校要想在发展中占据制高点,就得把这些政策吃透、用好。同时,这也是对国家号召的一种响应。”他说,“所以这种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青年教师许情倩作为所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也亲眼见证了教师们认同理论学习的过程。

“最开始动员大家参加理论学习的时候,虽然没有人不配合,但有一些人请假,后来出勤率

就上来了,到了周四,大家就觉得应该做这个事儿。”她说,通过理论学习,教师们还可以有机会聚在一起讨论工作、学术。“不用动员,就能感受到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转变呢?

从理论到业务

虽说是教职工理论学习,但除了理论知识外,还有业务内容。比如在4月13日的这次学习中,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就邀请资产管理处负责人为教师们进行了实验室安全和化学实验品采购培训。

“我们学院平时做化学实验比较多,因此实验室安全很重要,所以就安排了这些内容。”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曾芳说,根据教师们的实际工作需要,学院此前还开展过人事制度改革、科研经费管理政策改革解读、学生心理健康与应对等培训。

“在教职工理论学习中,我们积极寻找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和提高专业理论素养的契合点,将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有机结合。”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沈斌说,以理论学习保障政治方向,以业务学习促进专业提高,两者相辅相成,切实增强了教职工专业理论综合素养。

据沈斌介绍,为做到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的有机结合,学校在实际操作中努力做到了“三贴近”,即贴近需求、贴近实际、贴近教师。

“首先,我们以工作需求为抓手,制定符合教师教学、科研需求的学习计划。”沈斌说。同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紧密联系实际,不断提高教师们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学习内容为主线,学习主题紧紧围绕教职工学习、工作、生活展开,涉及教学技能研讨、科研能力提高、学生思政教育等内容。

将业务学习穿插在理论学习中,不仅增强了教师们的综合素质,同时也让北京科技大学的办事效率更高。

“比如今天,资产管理处处长带领主要业务人员来宣讲,很多事一下我就搞清楚了,要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去资产管理处咨询,就会很麻烦。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知识需求,这是集中性的问题,我们学到了知识,他们也可以一次性解决,提高效率。”该校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教师车平说。

从教师到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说,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办好高校的核心,而这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开展教职工理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据介绍,该校不仅规定全体校领导、有关单位的中层党政干部要走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思政课、形势政策课或党课,而且对讲课时长也作了要求:校党委书记、校长,各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每人每学期至少为学生讲授一次;其他学校副职领导和党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至少每人每学年为学生讲授一次。通过这一规定,北京科技大学每年都会有5000余人次的学生受益。

“此外,学校还选拔优秀教师担任学生党支部理论学习导师,加强对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和理论学习的指导。”沈斌说。目前,全校已为300多个学生党支部配备了理论学习导师。去年7月份刚入职的孟涛是一名辅导员,同



一名教职工正在向职能部门负责人请教问题。 王之康摄

时也兼任着一个学生党支部的理论导师。对他来说,每周四下午的理论学习教育就像一个“加油站”。

“我是学机械专业的,对理论学习相对陌生,但作为理论导师,又时常需要给学生党支部作指导。”孟涛说,“说实话,以前有些新政策只是听说了,可能不是很了解,通过现在的理论学习,不仅自己加深了认识,指导学生党员时也就心里有数了,现在组织师德师风专题学习,大学英语系事迹人选教育部‘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

经过一年半的实践,北京科技大学教职工理论学习也取得了诸多成效,增强了教职工的学习意识,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也促进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比如,土资学院矿物加工工程系将理论学习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取得优异成绩;外国语学院多次组织师德师风专题学习,大学英语系事迹入选教育部“师德建设优秀工作案例”。

接下来,北京科技大学还将进一步规范教职工理论学习,提高学习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并组织教职工走出校门,到社会实践基地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以拓展教职工的视野,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和校情,为他们的综合素质再提升助力。